

宋代茶政的当代追问

——以茶叶经济制度为例

章珂熔¹ 胡燕² 应瑞瑶¹

(1.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宋朝是茶叶生产、消费、贸易的兴盛时期,宋朝出台了各种茶叶政策,以茶叶经济制度为例,可以分为三说法、贴射法/见钱法、林特茶法、通商法、水磨茶法。这些茶叶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满足特定需要产生的,对当时社会,包括财政和茶商茶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经济学理论,并结合史实来分析这些影响,得出通商法是最有效率的茶叶经济制度,这有助于我们结合当代国内茶叶消费有待提高的现状,提供具体的路径选择和改进思路。

【关键词】宋代;茶叶;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2-0081-12

The Contemporary Questioning of Tea Policy in the Song Dynasty

——Taking the Tea Economic System as an Example

ZHANG Ke-rong¹ HU Yan² YING Rui-yao¹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5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ea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rade. The Song Dynasty introduced various tea policies. Taking the tea economic system as an exampl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anshuo method, Tieshe method /Jianqian method, the Linte tea method, the trade law and the Shui-mo tea method. These tea economic systems have all been produced to meet specific need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ety at the time, including finance, tea merchants and tea farmers. Using economic theory and combining historical facts to analyze these effects, we find that trade law is the most efficient tea economic system. This conclusion will help us to propose specific improvement options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which contemporary domestic tea consump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words: Song Dynasty; tea; economic systems

中国虽然是茶叶原产国,同时也是产茶大国,茶叶质量也日益得到重视^①,但目前的人均茶叶消费量却仅列全球十几名开外。而宋朝是茶叶生产、消费、贸易的兴盛时期,宋朝出台了各种茶叶政策,这些茶

[收稿日期] 2020-01-20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章珂熔(1994-),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胡燕(1972-),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应瑞瑶(1959-),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① 胡燕、盛开、郑旭媛:《茶叶供应者质量安全认知与行为分析——基于浙江500位茶叶供应者的问卷调查》,《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年第12期。

政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满足特定需要产生的,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宋朝时实行的通商法对当代影响最大,使得茶叶的自由贸易得以实现。那么,宋朝的茶政制度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呢?其对于当下茶叶经济的发展又有何启示呢?

一、茶叶经济制度的种类

宋初实行榷茶制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设立江南榷茶场。“岁课作税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茶农生产茶叶,一部分作茶园租税缴纳官府,剩下的全部由官办山场收买,不能自由出卖。一年收税865万余斤。太平兴国八年(983),因为民间有许多人旧茶园荒芜,特规定他们免税,而对于那些应当以茶代税而又没有茶的人,允许他们以其他物品替代茶叶交税。

景德三年(1006)三司使丁谓曾提到“三说法”(“募人入中西北刍粟,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法’”)的得失,说到:“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虽屡变法然不能止弊。”“三说法”仍有缺陷。

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废“三说法”,改行“贴射法”,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官府一方面向园户征收实物,一方面向茶商收息钱。仁宗景祐元年(1034)实收钱59万缗。仁宗嘉祐三年(1058)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542211贯524文。嘉祐四年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取消榷茶法,改行“通商法”。官府向园户收租钱,以3倍旧税为率,可得170万缗;商贾贩茶交引收钱68万余缗,共230多万缗。英宗治平三年(1066)茶户租钱329855缗,又储本钱474321缗,而内外总收茶税钱498600缗。

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八年(1085)蜀道茶场有41个,京西路金州有6个,陕西卖茶为场之处332个。税息到李稷(熙宁十年至元丰四年)时加为50万;到陆师闵(元丰五年至元丰八年)为100万。

徽宗崇宁元年(1102)恢复贴射法,一年收入净利320余万贯,而诸县商税75万多贯,不包括食茶税收,有时到500余万缗。徽宗政和二年,下诏福建茶园按照盐田丈量土地,产茶多少,依等级交税。自茶法更张后,至政和六年,五年间共收息1000万缗。

高宗建炎二年(1128),赵开参照卖引法进一步完善,在成都设立合同场买引所,就近卖引,仍在合同场设立茶市,交易必须经由茶市进行,以茶百斤为一大引,茶与引必相随。凡是买茶引,每斤春茶七十文,夏茶五十文,仍旧加收市例(又名市利钱,宋代商业附加税之一)、头子钱(手续费)。建炎四年(1130)茶引收息170余万缗。绍兴后,茶马司又增引钱,于是茶马司一年遂收200万缗。每年以200万缗为例。绍熙初,成都府利州路23场一年收入2493000余缗。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嘉泰四年(1204)知隆兴府韩邈奏户部,茶引岁有常额,隆兴府惟分宁、武宁产茶,他县并无,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领租,借官引以穷索,一乡无茶者使认茶,无食利者使认食利,所至惊扰,乞下省部,非产茶县,并不许人户擅自认租,它路亦比类施行。”说明恶霸土豪借茶税的名目,巧取豪夺。

真德秀《大学衍义》:“呜呼!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其食者茶也。既以税其食,而又税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税之。民亦不幸而生于唐宋之世哉。”^①可见茶税对普通百姓影响之大。

(一)三说法

宋太宗赵灵为了攫取茶业厚利,推行茶叶官买官卖制度。太平兴国二年(977),“凡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民卖茶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②

当时茶叶专卖有两个特点:①茶农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以折税茶代替租税缴纳官府外,剩余的茶

① 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43-444页。

② 陈椽:《茶业通史》,第399页。

叶全数由官府所设的山场收买,不准自由出卖;②每年收买的茶叶,事先定好收买价格,由官府预先贷款给茶农,这种贷款叫本钱,在缴纳茶叶时按照贷款额缴二分利息,一并折合茶叶,交给山场。这是一种高利贷剥削。

当时茶叶交易种类很复杂,有几百个等级。各个等级的价钱相差很大。官买官卖的价格,也事前定好,在形式上正像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国政府的“毛茶山价”和专卖牌价,本质上是一种剥削方法。官府垄断茶叶交易的独得利润很高,买入卖出茶价相差在一倍以上。商人买卖茶叶要以官府给券为凭,就是要有专卖证。

太平兴国八年(983)“禁伪茶,除旧茶园荒废外,皆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官府通过这种办法,扩大茶税范围,搜括其他物产。雍熙末年,“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值,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当时西北急需军用草粮,令商人运卖。西北收到草粮,发给凭证,叫做交引,凭证就到江淮、荆湖的官府所设收茶山场领茶贩卖。运茶要带茶引^①。

太宗至道二年(996),宋政府垄断淮南盐,原来规定以茶盐二者为入中(为了筹措战备物资,北宋长期采用入中制度,利用商人转运钱粮于西北。商人将物货入纳沿边州或京师,异地支付茶、盐、香药和钱等)报偿的,现在都以茶为报偿。但是,与盐引出现的弊病相同,边地为吸引商人入中,故意高估入中粮草的价值。入中者虽被交引铺居间剥削,还是有不少利益。商人为图厚利,遂争先入中,以致边地所发交引愈来愈多,而支付交引的货物储备只靠茶叶一宗,因此茶商们持交引去提货时,场务储茶告罄,再也交不出现货来,往往提出几年之后再交货。交引既不能兑付,于是京师交引市场价格暴跌,甚至跌到与入中物资的实际价格相等,商人和入中者再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边地入中已难以为继。宋政府不得已,于咸平五年(1002)将入中的报偿扩大为茶、香和东南缗钱三种。这种偿付方式被称作“三分法”^②。

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理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

三说即三税。当时宋政府对外用兵,兵食不足,不得不先把本年度的“交引”以低价抛出来换兵粮。如每给值10万茶,抛售7.4万实钱,镇戍军(今宁夏固原)入票值2.8万,定州(今甘肃定西县)入票值4.2万,给茶皆值10万。所谓虚估给券,虚钱得实利,大家争取交引,以后虚估越来越高,茶价越来越低。虚估的交引并不是全部抛出给商人,很多是“土人”,既不知茶利的多少,又急于卖钱,得到券就转卖给茶商,或京师的坐商号。茶商和交引铺拿到引票后,不但能自出茶的山场提取价值10万的茶叶,一转手就获利5万。并且引票兼有贸易作用,可以汇兑和当纸币使用,从而更大量囤积。因此,当时的首都开封,纷纷设立起来交引铺。这些商人大都是与官僚勾结在一起的官僚资本。当时茶商的势力大到可撤换官吏。茶商趁官府要钱的时候,以低廉的代价来攫取交引,获得厚利。茶商每年掌握官府所抛的交引,茶民两三年生产的茶叶还不够偿付。正如三司使丁谓计算税收得失,说“边采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豪商大贾。”^③

边地官吏的虚估也使宋政府受到非常巨大的损失。真宗景德中,三司使丁谓指出:当时边防各地因入中所获得的粮草仅值50万贯,而东南原有360余万贯的茶利,入中的结果是二者相抵,宋政府对茶叶官卖的利润几乎全部落入商人手中。

直到景德二年(1005)宋辽议和的“澶渊之盟”以后,沿边驻军减少,边防粮草缺乏的现象才有所缓和。宋政府便命盐铁副使林特等召集茶商讨论新法,取消了边地官吏任意高估入中货物价格之权,改为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内容大致如表1。

① 陈椽:《茶业通史》,第399页。

②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陈椽:《茶业通史》,第400页。

表 1

入中货物价格与所换茶叶价格

入中货物价格	换得茶叶	备注
于京师入金银绵帛价值 50 贯的	给 100 贯实茶	如要海州榷货务的茶则加纳 5 贯(海州地处今江苏连云港,与其它场务相比,距北方最近,商人在此买茶可节省不少运费,故买此处茶引要加钱)
于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价值 50 贯的	给 110 贯实茶	次边给 105 贯实茶(次边不给海州茶)
于河东入中价值 50 贯的	缘边给 108 贯	次边给 106 贯实茶,但均不给海州茶
于陕西缘边入中 50 贯的	给茶 115 贯	若要海州茶的需入中价值 52 贯的实物

资料来源:沈括:《梦溪笔谈》卷 11《官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这种改革后的新法称为“三说”。在未改法前的景德元年(1004),政府名义上获茶叶一年赋税 569 万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虚抬入中货价计算出的,实际交纳的实物折成市价要低得多,因此财政不免亏损。改法以后,景德二年得 410 万贯,三年得 208 万贯,这些收入是实际的赋税。于是林特等参加改法的人皆因功升迁。

此后约十几年间,茶法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到真宗乾兴年间(1022),宋与西夏的关系很紧张,因而兵费不足,为解燃眉之急,西北边地终于冲破了政府的统一规定,回复到景德改法前的状况:“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毫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①

康定元年(1040),叶清臣为三司使,当时河北谷贱,因此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仁宗庆历二年(1042),募人入刍粟 20 万石,自此又实行三说法。庆历八年,盐铁判官董洙亦请复行三说法,然而三司仍决定用见钱法,京师钱入少出多^②。皇祐三年(1051)二月,宋朝政府采用盐铁判官董洙的建议,在河北边境地区执行三税法,在内地州、郡实施四税法。监榷货务薛向坚决反对董洙的意见,他认为,政府在内地执行四税法,必须从开封府支出比往年多一倍的现钱,而茶、盐、香药等物品往往是生产多而用途有限,因而不仅会贬值,而且还卖不出去。这对政府、对商人都是极为不利的。宋仁宗将薛向的意见转达给执政大臣讨论,但执政大臣不支持薛向的改革方案。几年以后,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榷货务积累交引钱达七百万贯,但政府无钱支付这一大笔现金,而堆积在榷货务的茶、盐、香药等货物却腐坏变质,卖不出去,因而边境地区的军粮购买亦陷入困境。宋仁宗不得不命令三司使王尧臣改弦更张,薛向担任王尧臣的助手,罢黜了董洙,恢复河北地区入中粮草的见钱法。

(二)贴射法/见钱法

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封建政权不得不依靠商人,使商业为它的统治服务。端拱二年(989),不仅边地入中恢复如旧,兼又新增了京师的“折中”,商人在京师缴纳粮食,与边地入中一样,能够取得贩卖茶盐的权利。淳化二年(992)又一度废止了榷货务,并且大减茶价,让商人直接到江南出茶各州军的山场去买茶,称为“贴射法”。这样,政府可以节省一笔可观的运费,而商人则能得到新茶。但这种方法实行后,商人感到江路回远,运输很不方便,而政府有关财政部门又觉得减茶价后赋税收入减少,所以淳化四年不再实行贴射法,又设置榷货务^③。

①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陈椽:《茶业通史》,第 401 页。

③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仁宗天圣元年(1023)令三司使李咨等计算税收,虚数多而实利少,因此不再实行三说法。三司使计算十三场的茶叶买卖的本息数目,取消给园户“本钱”,由茶商直接向园户进行茶叶买卖,官府收其本钱利息。如茶每斤售钱56文,本钱是25文,商人买1斤茶叶,须先向官府缴纳31文的利息。根据商人所指定的买卖地区,官府发给茶引为验,商人然后凭茶引买茶,每斤付给园户25文,叫“贴射法”。这是商买商销的方式。无人贴射,由官收购,是官卖商销的方式。在贴射法下茶农一年辛苦所得还不如官府的利息。

商人入纳刍粟(供军队用的饲料和粮食)于塞下的,对其的支偿,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有所调整。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钞引,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一切以缗钱支偿,谓之见钱法。想要其他州的茶叶也可以,但茶和边杂各以实钱出纳,坚决反对利用虚估牟取暴利。这次专卖制度的特点,是官府没有贷放本钱,而收很大的利息,并减少茶叶进出手续,节省开支^①。

仁宗天圣元年(1023),宋政府采纳李谔的意见,设计置司,考察茶法。计置司列出收支概况奏上:“淮南十三山场卖茶年额近五十万贯,天禧五年只收二十三万余贯,比祖额亏二十七万贯。今将五年卖茶收钱折算,每百贯交引,在京见卖价钱五十五贯,都计实钱十三万余贯,内除买茶本钱九万余贯外,有利钱三万余贯。若每年趁及元额五十万贯,裁得实利钱七万余贯,监官请给费用不在数。以此折算,课额虚数甚多,或交引价减,必转陷失欲望。”^②因此他们力主废止“三说法”,在十三山场实行“贴射法”。政府对茶产不再收购,但园户所生产的茶仍须全部送往收茶机关(山场)进行贸易,以便商人自由选择。商人认购需向政府交纳“净利实钱”,原先每年园户所领本钱,政府不再发放,由商人直接付给园户。

商人虽与园户直接买卖,但并非自由交易,因为茶价和茶额都是政府规定的,交易也须在山场的政府官吏监督下进行,商人所买的全部茶叶都由政府给券作为证明,目的是防止私售。根据往年产量状况,政府还规定了园户的生产定额,过期完不成定额的,按所亏欠的数量依照商人贴纳之例向政府交净利钱;园户按定额生产的茶叶如卖不完或无人买,则都由政府收购。

至于六榷货务的茶,仍采用天禧旧制,只是提高了纳钱数额,海州荆南茶由原入钱八万增至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茶由入钱七万四千增至八万,皆支給实值十万的茶。入中办法仍然实行,但对入中货物的价值一律改为实估,只按边地的远近程度给予不同的优待。如以值一万钱的刍粟为准,远者给券一万零七百,近者给一万零三百,商人持券到京城或别地换领现钱,名为“见钱法”。若商人不愿领现款而愿得茶、盐、香药等物,也可听其自便。

贴射一见钱法对政府非常有利。第一,政府不给本钱,坐收净利,岁入相当可靠。第二,杜绝了虚估的损失,边塞军需有了保障。同时对商人也有利,因为他们直接与园户交易,所得的都是好茶,没有被山场硬派陈茶恶茶的损失。

新法实行仅一年,京师榷货务的收入增加了104余万贯,边地马草增加了1169万围,军粮增加了213万余石,而茶、香和东南缗钱的支出反减少了171万缗,总计所增加的收入和省减的支出共为650余万贯。过去各边粮草的储量常感不足,这时一般都有二年以上的储量,多的甚至有四年的储量。新法的成效颇为可观。

但这对相互勾结非法图利惯了的贪吏和奸商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交引亦不可能再作为投机的对象,于是他们群起攻击新法。朝廷大员又顾虑用现钱偿付入中会使京城的府库储币陷于空竭,便也应声附和。这两种反对势力异常强大,弄得宋仁宗也视听眩惑,下诏责备计置司,李谔及财政主管当局条上利害,把新旧两法作详细的对比,说明新法对政府绝对有利,并劝朝廷勿为流言所动摇。朝廷遂暂时同意了李谔等人的意见,并赏赐改法的官吏,宣布新法推行不变。但反对派却不肯就此甘拜下风^③。

天圣三年(1025),朝廷再命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人研究茶法,权衡利弊得失。孙奭便乘机对新法猛

① 陈椽:《茶业通史》,第401页。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0《茶法杂录上》。

③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烈抨击,说:“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十三场茶积而未出售者,六百一十三万多斤。”指出十三山场已滞积613万余斤茶卖不出去,因为商人所贴射的都是好茶,余下归政府的则多半是无人问津的劣质货;同时新法中规定园户完不成定额就要反贴赔净利钱,而园户都是普通百姓,贫弱且无力反抗,甚至少数私贩借贴射的名义,强买或私买民茶的现象,也成了攻击新法的口实。反对派这次的攻势获得成功,同年十月,实行不满三年的贴射一见钱法被明令废止,推行新法的官吏分别受到罚俸、降职甚至刺配沙门岛的处分,李谠也被赶出中央政府。取代贴射法的是复行三说法。此后,入中粮草的虚估现象首先恢复,过去茶制的一切弊政也都相继出现。十年后,李谠又回到中央政府执政,主张贴射法的人才重新抬头。景祐三年(1036),三司吏孙居中等说:“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河北转运使杨偕陈述三说法12害,见钱法12利。李谠等说:“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复罢三说法,恢复贴射法^①。因此景祐三年(1036)恢复见钱法,“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并为根绝投机商与贪官互相结纳起见,将入中商人领款必须由交引铺作保的办法也明令取消。李谠还恐怕反对派会再次反攻,又向仁宗提出:“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皇帝为此下诏戒敕。但反对派的实力并不因此稍见削弱,这样,主张茶专卖的人便分成贴射一见钱法和三说法两大营垒,此起彼伏,争闹不休。如庆历八年(1048),主张三说法的又占了上风,入中的偿付仍以实物为主,边地虚估弊病再次出现,入中之券到京师,因南商所抑又大跌价,北商无利,入中的人很少。到皇祐二年(1050)再行见钱法,边地入中的人又增多,他们拿交引到京师提取现钱,而京师钱少,不足以兑付,商人持券往往需等待数月或逾年,不得已低价抛售。交引跌价,入中无利,若不提高粮草价格就无法招徕,于是见钱法也阻止不了边地虚估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宋政府可以说是已到了山穷水尽、束手无策的地步,无论三说法还是见钱法都已无法维持下去^②。

(三)林特茶法

景德元年(1004)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就此西北二边都暂得平静,边费的紧张状况也稍稍松弛。刚得喘息的宋政府开始解决沿边入中对茶盐之利的损耗问题。于是出现了景德二年林特等人的茶法改革。主要目的是降低茶叶折中的虚估。但林特茶法是一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茶利虚估的问题,更未能减少沿边入中的虚估。

林特茶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限定加饶数额 规定:“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增茶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沿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也,河东缘边皆不得射海州茶。”^③将虚价与实价之比限制在2:1左右。即《宋史·李溥传》所说:“募人入金帛京师入刍粟塞下,与东南茶皆倍其数。”海州茶因“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④景德二年令不许河北次边及河东缘边、次边入中算海州茶,同年九月两路与陕西皆可算海州茶,虚实比为100:55^⑤。应特别注意的是,新法的算茶是以入中钱物实值计算,而非用虚估价格直接算茶。

(2)规定商人以新引与旧引对带折纳及逾期贴纳法 由于林特法限定算茶的虚估比例,商人入中交

① 陈椽:《茶业通史》,第401页。

②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③ 《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④ 《宋史》183《食货下五》。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6。

引便出现了按原来虚估之制的旧引和改法后的新引。新旧引所含虚估相差颇大。为了保证新引的发行,林特规定了新旧引的对带折纳之法:“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依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①榷务卖茶以商人到务先后为序:“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②为了防止铺户豪商的投机,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取消商人持引到榷货务兑物须铺户作保的制度,令商人直接往榷货务兑引,但商人执交引到场务算茶皆有限限,河北河东为十日,陕西为五日^③。“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④

(3)中央派遣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 “景德改法之后,常遣使臣三人分场提点,率以三年一替。”提点使臣的职责是稽查各场事务,弹劾失职的场务监官,但提点使臣任期太长,“在任既久,多与场务款熟,无所振举。”又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省淮南十三场提点使臣,每年旋差使臣四人,分定场分买纳,并与逐场隔手算买。”^⑤改三年任期为逐年派遣。新法还包括“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货务交足而有羨余者,即理为课绩。”^⑥

(4)贱价收购旧交引 如《文献通考》卷十八所说:“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改法之初“元定百千交抄,官给十九千。”但由于豪商富民投机炒买“折其价值既贱市之,”交抄急剧贬值。政府也改变收购价,“依市人所买例,每百千,有加拾者官给十二千,无者官给十一千市之。”^⑦此后交引价一再下降,甚至到每百千才售九千、八千,以致五千。天禧元年(1017)二月官收市引价又改为“官自收市以九千为准。”^⑧有时“陕西交引逾贱,鬻于市才八千。”而最甚时陕西交引“京师裁直五千。”^⑨官府贱价买引就是对入中商人利益的分夺。

(5)贩茶商税统一交纳到京师 “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⑩《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九载,“商税之外,商人持引至榷务已得茶者量抽十之一,但三年并赴务买茶,即于正茶外兼还所抽以平其价。”商人贩茶须请引:“自今诸色人将带片、散茶出(开封)新城门,百钱以上商税院出引,百钱以下只逐收税。村坊百姓买供家食茶末五斤已下出门者,免税。商买茶货并茶末,依旧出引。”^⑪

(6)分等收购,等外纳官 “(国户)所造入等则给价值,不入等既不许私卖,亦皆纳官。”^⑫

从林特茶法的内容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林特茶法只是对茶叶折中法,即茶叶销售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茶叶产销制度的根本变化。它对榷货务山场的榷茶体制没有改变。收购环节仍由官府独占,茶叶的批发仍由榷货务山场担当,商人算茶仍是先于京师或沿边入中钱物买引。因而林特茶法又被称为“折中新法”^⑬。从性质上来说,林特法仍然是交引法。它与旧交引入中法相比,大大降低了虚估。《文献通考》卷十八载:在旧入中法下官府“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拾以利之。其后理财之臣往往以

①《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②《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6。

④《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5。

⑥《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11。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二月甲戌。

⑨《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⑩《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⑪《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15。

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景德二年八月庚寅。

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丁巳。

遗利在民,数务更张,大概无过李谿、林特二法。”李谿法是贴射法,它使茶叶与沿边入中脱离直接关系,官府收取稳定的净利。林特法是改良后的交引法,它起到了降低虚估的作用,但没有李谿法彻底:“(林特法)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拾未远也。”马端临对林特茶法性质的看法是正确的。林特茶法只是降低了虚估,而没有根除虚估问题。

其次,林特是以充实京师为目的。在宋初商人入钱京师,每缗加绕只有二十文^①。后虽有增加,但远比沿边入中低。林特茶法规定的虚估,京师与沿边基本相等。商人赴京师入中,费用、风险比边境入中少得多,在同样的加绕下商人当然乐于到京师入中。茶商将税钱统一交纳于京师也有利于充实京师钱用。这是因为宋朝京师周围常年屯驻数十万禁军,加上庞大的官僚的开支,用度日益增加,加之金银钱帛走私境外,使国内钱货紧缺,出现“钱荒”,钱重物轻,商旅不愿以钱入中,更加剧了京师缺钱的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十月癸丑条载,以后屡有改革林特茶法之议,“大抵皆(因)吝茶之出,而须钱实京师,故法不能变。”

再次,加重对园户和商人,特别是小商的剥夺。林特茶法收购标准过严,损害园户利益。新法规定茶叶入等者才给价收买,不入等既不给价,也不许园户私卖,须全部入官。真宗也觉得这一规定“过于严急”,“若令一切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多贫民,倘斥去之,安知不聚为盗寇?”因而令“此等事宜即裁损,务令便济。”^②虚估比例的降低、新旧引的对带折纳、持引算茶的立限、低价买引等等措施都是剥夺商人的利益。特别是设立程限、分色号年次给茶及贴纳之制对小商尤为不利:“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反贱鬻(茶引)于豪商,有司从移用之便,至有一岁之内文移至十数变者,商人惑之,顾望不前。”^③臣僚言:“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④

总之,林特茶法改革是虚估成为茶法最大弊端后的首次改革,是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却未能根除虚估之弊,而且自身的不足也日益显现。朝野不断出现对林特茶法进行再次改革的要求。但林特茶法仍然得以延续,终真宗朝都无大的变动,并成为仁宗朝茶法的一项基本制度^⑤。

(四)通商法

至和三年(1056),针对入中制度带来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河北提举余便粮草薛向建议,废止入中粮草,改为由政府役使民夫运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和籴是北魏至明清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宋初,狭义和籴特指政府以现钱收购粮食,广义和籴则包罗各种籴买方式),只有入中刍豆可以计值给茶。政府采纳了这一方法,后来为免除刍豆虚估的情况,不再给茶。改为按当地市价收购,持券至京师以银绸绢为报偿。这时茶和边籴完全斩断了联系,三说法和见钱法的纷争便告结束,而通商的主张开始引起重视。

早在景祐年间(1034-1038),叶清臣上奏认为:“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因此他主张取消茶专卖,令天下通商。这样就可以通过对茶商征收各种商税,及在全国各地普遍增加丁赋,保证获得超过茶专卖好几倍的收入。三司讨论认为该方案不可行,故废榷通商的要求未能实现。到嘉祐(1056-1063)年间,开禁的呼声渐高,内外官吏如何鬲、王嘉麟、沈立等先后上书,请求取消茶专卖,陈说通商之利。这个主张得到当时的执政官富弼、韩琦等人的支持,因此到嘉祐三年(1058),仁宗命韩绛、陈升之等在三司设一专门机关研讨,商议结果,三司提出报告认为专卖收入极少,但对人民的烦扰极大,仁宗又派人到各地调查专卖制度的实施情况,这些人回来后,也同意三司的分析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庚午。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庚寅。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

⑤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31页。

和措施。这样仁宗便决意于嘉祐四年下诏,取消茶专卖,除品质最好的福建腊茶仍然禁榷外,余下各种茶产都允许自由贸易。具体办法是“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将原来政府的茶课收入,均摊在园户身上,这叫做“租钱”,园户交了租钱以后就可自由卖茶。政府不再预借给园户本钱,取消山场制度,商人直接向园户买茶,不再受政府干涉,只是在运销过程中由政府征收通过税和销场税。

通商法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各种茶税的总和并不及专卖利益多;园户则因本钱停止发放,同时交租钱又必须是现钱,资金严重不足,以致破产亡家;通商使原有的高额垄断利润不复存在,因此大商贾不愿再从事茶叶贸易,仅剩些小商贩经销,政府税收减少,一切情形并不理想。许多朝臣如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等皆上奏疏,主张恢复专卖,但当初仁宗下诏宣布通商法时曾规定禁止议论,违者重罚,因而这次改法的要求未能形成势力,自由贸易制从此实行了相当长时间^①。

(五)水磨茶法

水磨茶法是北宋后期在汴京及周围地区实行的榷茶制度,是在熙丰变法时期中央加强财权,开拓利源的背景下产生的,对供给京师财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水磨茶法有过几次兴废的反复和实行地区的变动。其兴废变动按照时间可以划分为元丰年间、哲宗朝、徽宗朝三个阶段^②。

水磨茶法建立于元丰中(1081),史称“元丰法”,从此将水磨末茶列入朝廷垄断经营的范畴,官营水磨也成了北宋榷茶的衍生机构,民间茶商必须从官办茶叶管理机构(山场)取得经营许可证(茶引)后,才能从官营水磨茶场获得(批发)末茶,而且只能在京城范围内卖。

王安石曾说过:“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由于宋代茶叶在食用方法上沿用唐法,所以这种被磨细的末茶也就特别受到民间的青睐。《宋史·食货志》记载表明,水磨末茶是宋代末茶的主流,也是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还曾施行过专门的水磨茶法(元丰法)。但研究表明,这一水磨茶法纯粹是北宋朝廷贪图水磨末茶利厚,是与民争利的一种反映,后于政和年间叫停。

二、茶叶经济制度的影响

(一)对财政的影响

我国从唐德宗782年即开始征收茶税,茶税成为历代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如四川的茶税利润从北宋熙宁七年(1074)开始,1074年至1077年这三年间的每年茶税30万贯,1113年达到310万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茶税收入达到每年200-300万贯。当时四川地区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是来源于茶税。这些茶税既是购买战马的经费,又是其他财政开支的经费^③。

但宋朝初期,朝廷为了取得丰厚的财政收入来巩固统治,对茶叶实行专卖政策,原来的茶市逐渐凋敝,同时私茶开始泛滥。嘉祐年间(1056-1063),宋仁宗接受王安石建议,把茶叶专卖制改为通商制,即由商人运销,朝廷征税。此举减少了缉私对人民的滋扰,茶市又恢复了繁荣,财政收入也增加了。当时朝廷年商税收入为2000余万贯,而茶税收入为100多万贯,茶税也成为税收主要来源之一^④。

宋代设榷货务,即司茶政官署。宋初,茶叶生产完之后都是由官府收买,官府再卖给商人,从中收取利益。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改为通商法,官府对茶户和茶商分别征税,让茶商与茶户自由交易。此后茶法随时随地屡有变更,但无非或专卖或征税而已。

征收茶税也有利于养兵。宋代对茶叶的管理之法很纷繁复杂,但基本上每一次茶叶政策都与养兵

①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③ 王曼曼:《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茶马古道》,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7页。

④ 伏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与茶税的开征》,《国际税收》2004年第5期。

问题有着密切关系。茶税是指政府向商人和园户(茶户)征收的租税,茶利则指国家专卖茶叶的收入。宋代茶的税利有多少呢?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国朝茶利”载:“专卖时,年均获利六十四万九千余贯,茶钱四十六万五千余贯。通商后,年收茶租三十六万九千余贯,茶税八十万六千余贯。每年总计都是百余万贯。”但据《宋史·食货志》载,“至道末年(997),仅茶税收入就有二百八十五万二千贯,天禧末年(1021)茶税为三百三十万二千贯。”两者数目相差较大,可见各个时期收入是不一样的。从税利之额来看,在盐铁酒茶诸项中,茶仅次于盐之利,居第二位,数量是很可观的。

那么,宋朝茶的税利是否用来养兵呢?

《宋史·索湘传》载:真宗即位,索湘充河北转运使,“会内殿崇班阎自新建议,请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收其利以资军用。”《宋史·食货志》“均输之法”中云:“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南宋初,赵开治蜀,金人来犯,赵开“馈饱者十年,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其办法就是广泛进行“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到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仅成都利州路岁入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贍军。”^①由此可见,两宋茶之税利,许多时候都直接用来养兵备战,宋朝茶之税利对维持军队的贡献是很大的。

然而,针对茶叶的征税,并不是征的越多越好,即税收规模与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而是倒U型的关系,即随着税收规模增加,税收收入先增加,而后下降。

(二)对茶商、茶农的影响

茶商的资本量很惊人,宋代实行榷茶,官府几乎控制所有茶源,先是低价向园户买茶,然后高价向商人卖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商人必须向官府纳钱或物方能购得茶叶,官府也唯有依靠向茶商售茶才能实现盈利。二者相互依赖,共同从茶叶生产者、消费者中获取利益。他们一方面是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围绕着如何瓜分茶利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宋代茶法的频繁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博弈的表现。在这种共生的利益关系中,茶商们取得了丰厚利润。真宗天禧元年(1017),一个叫田昌的大茶商,从舒州的太湖场,一次买茶即达十二万斤,如果加上羨数则有十九万斤,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在福建至京师的商业大道之上,“何客棹之常喧之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万车夕载,西出玉关,北越紫塞”。早上在此卸空货物,当晚就有上万只车辆从这里装上车,向西送出玉门关。茶商的活动使沿途变得喧嚣,这是一种经年累月的影响。京城汴梁的茶商更是多达资金百万的,资金十万以上比比皆是。综上可见宋代茶商的数量之多、资本之雄厚。

在宋代的茶商中,还有一种类似于“包买商”的茶商。包买是一种商人操纵生产者的方式,茶商为了得到稳定的茶源以及扩大自己的收购范围,鼓励茶农多为自己生产茶叶,采取一种事先预付茶款甚至工费的方式,令茶农有条件去雇佣工人自己生产茶叶,出产后按照新茶的价格连本带息偿还一部分费用,这样一来,茶商就利用资金的渗透实际控制了茶叶的生产领域。盛产腊茶的建州婺源与四川彭州地区就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尤其以四川地区的情况来看,应当属于包买性质。这种做法甚至被宋朝政府所借鉴,对施行榷茶制度的影响也颇大,如广泛采取了官府先给茶户钱的方法采买茶叶。但姚治中先生在《论北宋茶叶禁榷制度》一文中认为,这种划分理论依据不充分,认为这种附带有超经济的政府强制行为与商业信用有本质的区别,也并不是包买商的经营方式^②。而且当时所谓的商业信用和雇佣现象都是在禁榷制度的前提下运作的,“预付本钱”只是禁榷制度的一种操作方式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普遍认为包买商的活动只能是在自由通商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由于资料匮乏,现今能看到的材料并不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发生了类似于包买商的经济活动,只可能是发生在当地茶叶的短期自由买卖时期,而这种包买方式后来被政府加以借用和发挥,茶叶包买这种经营方式也实现了官府取代普通商人的转变,这一方面是一种继承,另一方面是对其自由发展可能性的压制,所以茶

① 钟立飞:《茶叶与养兵》,《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② 姚治中:《论北宋茶叶禁榷制度》,《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叶包买商最终并没有演变成商业资本家。

宋代的茶叶经营者在主营茶叶的同时,也因势利导,利用自身店铺的名气和优势,从事多种经营活动。有的茶肆会根据季节的变化,经营其他相配的商品。还有的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撒子、葱茶,或者卖盐豉汤,以适应顾客取暖的需要,夏天卖雪泡梅花酒等,以适应客人降温解暑的需要。再如许多茶商不仅从事茶叶的转运贸易和批发经营,在实行茶叶专卖制之后,他们甚至开始兼带经营茶叶交易许可证“茶引”之类的批发业务,他们或通过交纳现钱,或通过入中粮草等途径,从政府领到茶引后再转卖给其他的中小商人^①。

一直到北宋末年徽宗时,为了增加收入以供统治者奢侈挥霍,蔡京当权后大改茶盐之法。崇宁元年(1102)又恢复东南茶的专卖,设置六个提举茶事司和四十多处茶场,园户仍旧用实物折缴茶税,即把全部茶叶卖给山场,禁止商人与园户私自交易。崇宁四年(1105),蔡京再度变更茶法,撤消各产茶区的收购机关——山场,商人在京师或地方领取长短引后直接向园户买茶,再到政府机关缴纳茶息和批引,茶的包装也必须用官制的“笼纲”。政和二年(1112),蔡京第三次改茶法,作了四十一条规定,有各种交易手续和罚规,比以前更加繁杂苛碎,并用严刑峻法禁制私贩。以茶法本身而论,虽不同于嘉祐通商法,但比嘉祐以前的专卖法,这次茶法对园户和商贩还是比较有利的,当然,宋政府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说:“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②

至政和六年(1116),茶叶专卖收益共达一千万缗,茶的产量也增加一千二百余斤,但是,这一成绩是靠加紧搜刮广大人民得来的。当时朝廷立比较之法,将征收商税的多少作为考察地方官吏的标准,收入多有赏,少则罚。因此地方官吏往往以提高当地茶的卖价招引商人来本地卖茶,如陕西甚至达到每斤五、六千文,这样高价的茶当然无人敢买,地方官便强迫摊派给店铺和百姓,此种专制条件下的剥削方式实在是惊人的^③。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征收茶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征税前,即不征税、完全竞争条件下或者说在通商法下市场均衡价格为 P_0 ,均衡数量为 Q_0 ,此时消费者剩余为 AP_0E ,生产者剩余为 BP_0E ,整个社会福利为 ABE ;征收茶税以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为 P_1 ,生产者实际得到的价格为 P_2 。而税收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即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因为市场的这一方较难通过改变购买量或销售量来对

税收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对于茶叶而言相对更加缺乏弹性,那么税收更多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反之则是生产者承担更多税负。此时交易数量为 Q_1 ,消费者剩余为 AP_1F ,生产者剩余为 BP_2G ,政府税收收入为 P_1FGP_2 ,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都受损,且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减少的程度要大于政府税收收入,无谓损失为 EFG 。而且税收规模越大,无谓损失增加得也越快。整个社会的福利是下降的,茶叶市场在政府控制下效率极低。在封建社会中,茶是统治阶级掠夺的对象。大小官吏借征收各种茶税之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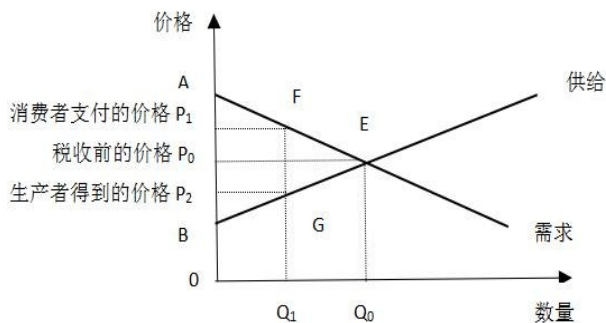


图1 茶叶市场均衡图

① 宋春:《宋代茶俗与行业经济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6页。

②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29,中华书局,1957年。

③ 张建国:《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④ 陈椽:《茶业通史》,第416-418页。

三、茶叶经济制度的启示

宋代茶法变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政府控制、调节茶的产销环节,增加茶利收入,或是适应政治、军事方面的某种特殊需要。尽管宋代茶法多次的变革导致了一些混乱,且茶法对茶业经济的管制具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讲,宋代茶法变革及其实施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宋代茶政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产生并满足当时需要,并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创造出一种最适宜的经济制度——通商法。通商法使得茶叶的自由贸易得以实现,政府不加干涉的自由贸易,是对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最好的一种制度,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结合当下,茶叶消费平均价格偏高,可以适当降低茶税,从而降低茶叶价格。

除此之外,比较当代和宋朝影响茶叶消费的因素(见表2),在宋朝征收茶税较高、流通条件较差、替代品较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茶叶消费仍然很多,因为有文化的因素。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千年大计。茶叶作为大运河上曾频繁流通的商品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也是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

表2 当代茶叶消费与宋朝之比较

当代茶叶消费	宋朝茶叶消费
市场经济,征收较少的税(其实更有利于茶叶消费)	征收较高的茶税(不利于茶叶消费)
流通条件较好	流通条件较差
替代品(如饮料)较多	替代品较少
收入较高	收入较低
部分人偏好	文化习惯

纵观宋代茶法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其实从未实行过全国范围的禁榷法或是通商法,这是因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而出现的不同,从侧面也体现了茶法政策的灵活性,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士大夫以及各阶层人们舆论的导向。在这些舆论或者呼声不断高涨的背景之下,官府权衡利弊,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对茶法随时做出调整。然而,不管政策如何变更,其目的都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这是其不变的本质,这也是理解宋代茶法之所以频繁更制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基于此,结合当下,对于茶叶政策的改革,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针对国内茶叶消费不足的问题,一是适当降低茶税,从而降低茶叶消费价格;二是渲染饮茶文化氛围,养生之道、哲学感悟、文人咏茶等,传承茶文化,转变人们的偏好,鼓励茶叶消费。

【参 考 文 献】

- [1] 钟立飞. 茶叶与养兵[J]. 农业考古, 1993, (2).
- [2] 张建国. 略论北宋的专卖法制[J]. 法学研究, 1997, (2).
- [3] 姚治中. 论北宋茶叶禁榷制度[J]. 皖西学院学报, 2001, (1).
- [4] 伏 杰. 唐宋时期饮茶之风与茶税的开征[J]. 国际税收, 2004, (5).
- [5] 黄纯艳. 宋代茶法研究[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6] 陈 椽. 茶业通史[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① 宋春:《宋代茶俗与行业经济问题研究》, 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第66页。